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里提出将沟通史部与集部的问题。【关于四部分类法的问题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Category:%E5%9B%9B%E9%83%A8%E5%88%86%E9%A1%9E%E6%B3%95>。】【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集部：《四庫全書》集部下有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五類。】

到了二十世纪现代教育的学科建制成型之后，史部与集部的关系就转化成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史正是沟通文学与历史学对话的一种形态。

那么历史学是如何影响了文学史的写作的？背景有三：

一，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从传统的政治为中心扩大到了文化史的研究。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进入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历史学的话语很多也被用于文学史的写作。

二，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倾向。就是以公认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去客观的、科学的对待文学。真实性、客观性由此成为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价值判断。

三，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的通史体裁也影响了文学史的编撰体例。另外，贯穿各个时代的文学的通史相对于编撰文学史的当下来说，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历史。编撰文学史意味着对过去的追忆和想象。具体来说，体现在：历史事件的编排有着一定的逻辑顺序。轴心概念和语汇、段落结构满足了对虚构的形式化的要求。

除了通史体例，作者还以举出另外两种体例，说明历史学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

一个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的体例是以唐代为轴心，反向延伸到汉代。同时以文体为切入口。

这一体例的形成有两个因素：

第一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方法。**所谓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方法，就是要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胡适用这个方法。是为了用历史的方法追溯中国自古以来的白话文学传统，从而捍卫其现实地位。唐代文学正是这段文学史的起点。

以文体为中心切入的话，就是以文本为中心，用治史的方法考察**文本之间的前因后果**。同时，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去看文本的发展背景。

第二是胡适对于史料的选择与审慎的考证。俗文学和敦煌文献等新材料的发现和验证都影响了胡适对白话文学史的写作。

另外一个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该本文学史的体例特点是：

一、材料的选择更广。超出了文字材料的限制。比如对出版业的考察。

二、叙事篇幅着重在唐代以后，以民间俗文学为主。

三、注重呈现资料的原始出处并交代前人的意见。

四、注重呈现集体创作和整个时代的风貌。【p75，新的文学史的叙述语言】

五、以外来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为叙事的动力。

这些特点是因为郑振铎在书写文学史时注重全面的史料搜集和对史料的辩伪。同时，他注重营造历史的氛围。

然而，在叙述文学史变化的时候，郑振铎并非以社会、政治经济等历史背景作为展开，而是以文体的变化作为分期。这种“逆潮流”的写法使得这本书不受欢迎。

客观和因明求变是历史学影响下的文学史写作的共同宗旨。